

# 叙事视角下跨族裔收养案的伦理书写——以《小小小小的火》为中心的考察

肖敏

华南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 中国·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美国华裔作家伍绮诗于 2017 年发表《小小小小的火》, 通过叙事视角的巧妙运用, 小说揭示了美国多元文化语境下不同族裔人群伦理身份的复杂性与伦理选择的冲突性。华裔女婴收养案作为小说核心伦理事件, 不仅展现了血缘、文化与法律之间的张力, 更通过多种视角的交织暴露出不同伦理立场下的伦理偏见与权力盲区。本文将从全知视角的权威性、限知视角的局限性以及视角转换的伦理引导三个层面展开分析, 结合文学伦理学的知识, 分析小说采用特定视角和视角转换的伦理意义, 解读视角如何在敏感的伦理话题前帮助读者作出合理的伦理反思和伦理选择。华裔女婴收养案的文学叙事深切地反映了在全球化移民热潮盛行的当下, 作者对社会移民问题、跨族裔儿童收养问题及底层女性生存问题的热切关怀。

**关键词:** 跨族裔收养; 叙述视角; 伦理书写; 伍绮诗; 《小小小小的火》

## The Ethical Dimensions of Transracial Adoption Under the Narrative Perspective: A Study Centered on Little Fires Everywhere

Xiao M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ina Guangdong Guangzhou 510000

**Abstract:** Celeste Ng's 2017 novel, *Little Fires Everywhere*, reveals the complexity and conflicts of the ethical identities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n the context of America through the use of narrative perspectives. The adoption case of a Chinese-American baby girl, as the core ethical event of the novel, reveals the tension between blood ties, culture, and law, and exposes the ethical biases and blind spots of power under ethical stances through the interweaving of multiple perspectives. This paper analyzes from three aspects: the authority of the omniscient perspective, the limitations of the limited perspective, and the ethical guidance of perspective shifts. By integrating the knowledge of literary ethics, it will explore the eth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novel's adoption of specific perspectives and perspective shifts, and interpret how the narrator helps its readers make ethical reflections and choices when facing sensitive ethical topics. It's believed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immigration, the literary narration of the case deeply reflects the author's ethical concern for the human predicaments such as immigration issues, cross-ethnic adoption issues, and class issue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society.

**Keywords:** Transracial adoption; Narrative perspective; Ethical writing; Celeste Ng; *Little Fires Everywhere*

## 0 引言

《小小小小的火》(Little Fires Everywhere) 是美籍华裔女作家伍绮诗于 2017 年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荣获当年亚马逊年度小说桂冠, 在美斩获了 27 项年度图书大奖。如吴玲 (2023) 所说, 较于前作《无声告白》, 《小火》进一步“突破了以往美国华裔文学仅仅关注华人移民及其后裔的书写传统, 将白人、非洲裔和华裔一并纳入小说的人物塑造中”<sup>[1]</sup>。以《小小小小的火》(以下简称《小火》) 为题, 小说主线矛盾围绕美国中产阶级理查德森一家与租住在他们家的母女米娅和珀尔之间展开, 副线华裔女婴争夺案随

着主线矛盾的升级也愈演愈烈, 华裔生母贝比·周与白人养母麦卡洛太太之间的冲突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力量, 叙事以一场打破了社区平静的人为火灾告终。

所谓叙事视角, 从字面看是指叙述者观察和讲述故事的角度, 在叙事学领域也被称为“观点”、“叙事视角”或“视点”等。经典叙事学热衷于对叙事视角形式上的分类, 叙事学家热奈特在其著作《叙述话语》中将叙事视角划分为三种类型: 零聚焦或无聚焦, 即无固定视角的全知叙述; 内聚焦, 即叙述者仅说出某一特定人物知道的情况; 外聚焦, 则指叙述者仅从外部客观观察人物的言行,

不透视人物的内心。<sup>[2]</sup>叙事视角不仅在形式上具有结构功能,更在故事内容的呈现上承载着深刻的意义内涵。80年代以来,后经典叙事学的分支叙事伦理学的发展使得作为修辞技巧的视角不仅仅在分类上受到讨论,也在伦理的视野下具有了伦理意义。《小火》一书通过多元化的叙事视角,揭示了发生在美国社会华裔女婴收养案这一伦理事件的复杂性。本文从叙事视角出发,结合文学伦理学的批评方法,解读不同视角下收养案主要人物所面临的伦理困境与伦理选择,并探讨作者如何通过视角安排和转换来描写特定的伦理事件中“伦理秩序的变化及其变化所引发的道德问题和导致的结果”<sup>[4]</sup>,以彰显文学的教诲功能并提供道德经验。

## 1 全知视角下的他者化: 东方主义凝视与伦理暴力

女婴收养案的叙事视角整体上采用了全知视角,小说一开始,全知叙述者以一种俯瞰的视角将美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展现在读者面前,并告知读者:“春天的时候,大家八卦的话题还是关于小米拉贝尔·麦卡洛,现在终于出现了更耸人听闻的新谈资。”<sup>[5]</sup>全知叙述者有意采用的局外人的旁观视角恰好契合西克尔高地的主流媒体和群众对收养案件的态度——仅作为看客来关注这一事件。女婴收养案之所以“耸人听闻”正是因为它涉及“华裔婴儿”这一特殊文化身份背景,更出于西克尔高地这一模范社区基于文化霸权对案件中的涉及的华裔人群投射其东方主义的凝视,这种凝视进一步解释了案件背后的文化冲突与权力关系。

贝比·周是在美非法移民,因生活陷入绝境而不得不抛弃孩子。麦卡洛一家是西克尔街区的白人中产夫妇,多年苦于求子未果,受到社工的收养通知时,他们迅速为被遗弃的女婴准备好物质条件并办理收养手续。双方为争夺婴儿的抚养权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法律纠纷。叙述者通过全景式视角展现了白人家庭的物质优越——她们拥有养育孩子所需的一切资源,“尿布、奶粉、漂亮的婴儿房和成箱的玩具。”<sup>[5]</sup>而在案件调查的过程中,贝比却被发现面临经济与精神双重伦理困境,但这被主流社会归结为她作为华裔母亲的文化血脉“不合格”的表现,贝比的贫穷和语言障碍也被归因于个人失败,而社会结构性对华人移民的歧视被选择性忽略。处于他者叙事策略的认知暴力中,社会底层的贝比的主体性意识、自我决定和自我言说的能力被系统性忽略而“丧失了表达自己的可能性”<sup>[6]</sup>。全知视角审视并揭示了这种评判背后所隐含的暴力偏见——底层女性贝比的母权因贫穷而被剥夺,而白人精英麦卡洛家的“无

私”因财富而被美化。

女婴周美玲(米拉贝尔)在全知视角下女婴的族裔特征显而易见,但西克尔高地的居民却一厢情愿地声称此案与种族主义毫无关联。全知叙述者通过细节的聚焦向读者揭示,麦卡洛夫人在见到米拉贝尔的第一天将其中文名字“周美玲”改为英文名字。“周美玲”作为一个被抹除的身份伦理符号,隐喻的是跨文化语境中被消声的弱势族裔群体。她的华裔身份被刻意抹除,意味着主体与其文化根源的联系被人为切断,在文化同化与身份消解的过程中,转而被期望“像典型美国女孩一样长大”<sup>[5]</sup>。但麦卡洛一家声称为了美玲不脱离其出生文化付出了诸多努力,如添置亚洲风格的艺术品、每月去中餐馆用餐、选择熊猫玩具等。全知叙述者通过对麦卡洛太太言行不一的对比观察,揭露了这种文化教育的虚伪性。正如社会舆论中支持麦卡洛夫夫妇的人所坚称的那样:“麦卡洛夫夫妇是在营救米拉贝尔。”<sup>[5]</sup>这种叙事再次凸显了萨义德(Edward Said)所批判的西方对东方的一种投射——将少数族裔儿童视为需要被西方“关注、重构甚至拯救”<sup>[7]</sup>的“他者”,将收养行为建构为文明对野蛮的救赎,从而进一步合理化白人中产阶级的道德优越性。

同样被聚焦的少数族裔还有为贝比辩护的反方律师艾德·林,其代表的是美国社会所期待的模范少数族裔的刻板印象。在全知叙述者聚焦于艾德时,叙述者观察到“他的身高高得出奇,足有6英尺”<sup>[5]</sup>,很明显此处的观察视角是基于白人社会对亚裔男性刻板印象得出的“高的出奇”的结论。读书时艾德和苏西·张,后者曾和麦卡洛太太同为啦啦队队长,是班里仅有的两个亚裔学生,但“这些事麦卡洛太太都不记得了”。<sup>[5]</sup>全知叙述者对艾德跨时空的观察以及对麦卡洛太太简明的内省概括,使读者明确感知少数族裔被主流社会忽视的伦理困境,这种困境并不能因为个人实现阶级跨越而改变,反而由于长久以来处于这种困境中,面临将“他者”形象内化的身份危机。聆讯期间,艾德的辩护策略被迫强调文化差异,来证明麦卡洛一家无法为婴儿提供族裔文化认知环境,他诘问麦卡洛太太的荒诞标准,比如能否说中国方言、能否在商场买到亚裔娃娃等,实则显现了一种东方主义认知暴力:中华文化简化为可量化的表演项目。另一方面,艾德林庭上质问麦卡洛家的行为,在正方律师理查德森操控的舆论下,转化为有侵略性的挑战,因为“愤怒的亚洲男子形象并不符合公众的预期”<sup>[5]</sup>,更是暴露了少数族裔在白人社会的脆弱处境。

在米拉贝尔案中,全知叙事者以客观权威的姿态介入

收养案的伦理评判,在呈现收养案的法律程序与社会舆论的叙述进程中,通过细节选择凸显了白人中产阶级的伦理优越性,通过对案件中的华裔母亲、华裔婴儿以及华裔律师遭受的东方主义凝视下的他者伦理困境,揭示了白人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下对少数族裔群体施加的伦理暴力。

## 2 限知视角的反抗:边缘声音的突围与伦理挑战

人物限制视角作为一种叙事策略,使叙述者以某一特定人物的身份在场,其认知范围与人物相同,因而视角具有局限性。然而,正是这种局限性赋予了人物视角独特的叙述话语权,使其能够基于不同的伦理判断和道德态度,直接影响读者的价值判断。叙述者以第一人称回顾视角,以贝比的人物声音揭示了其与男友不稳定的两性伦理关系破灭后暴露的多重伦理危机。危机之一是伦理角色的破灭。贝比追随男友从旧金山来到克利夫兰,但因为语言不通找不到工作,曾经设想的在美国买房成家的计划成为泡影。男友在贝比怀孕两周后把她抛弃在了克利夫兰,使她成为未婚单身妈妈。危机之二就是伦理身份的丧失。由于产后陷入了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困境,贝比遗弃了孩子,弃婴作为违背伦理道德的行为直接宣告了贝比母亲身份的终止。无论是伦理角色的破灭还是伦理身份的丧失,都给贝比这一人物带来无法愈合的创伤。但贝比的创伤经历在理查德森夫人代表的白人精英阶层看来,却被简化为贝比“不合格的母亲”<sup>[5]</sup>的证据。置身于种族、性别和阶级身份交织的暴力伦理环境中,创伤经历的反复出现以及外界声音的否定和质疑加剧了贝比自我价值和自我身份认知的丧失,贝比质问自己的内心独白由此构成强烈的伦理反讽:“究竟哪一个才是噩梦,我找不到孩子了,还是孩子跟着我。”<sup>[5]</sup>贝比的人物视角的讲述道尽了社会底层女性的艰辛,拉近了人物和读者的距离,有效地将读者拉入被法律理性压抑的情感维度之中。

麦卡洛太太的限知视角则暴露出另一种女性伦理困境。她的叙事始终围绕“不孕创伤”的执念展开。麦卡洛夫人婚后总是在“怀孕三个月、四个月和五个月的时候流产”<sup>[5]</sup>。每次怀孕都是失败的结果,而老友却生下了三个孩子,叙述者采用麦卡洛太太的眼光聚集好友的生育情况:到这个时候,她的老朋友埃琳娜已经生了一男一女,又怀上了老三...琳达都忍不住盯着理查德森太太圆滚滚的肚子,她觉得自己就像个变态,因为她非常想摸一摸朋友的肚皮。<sup>[5]</sup>此处的聚焦,暗示了麦卡洛太太对“合格母亲”

这一量化标准的内化。当女性的价值被简化为子宫的孕育功能,无法实现母职的麦卡洛太太必然遭受双重的身体与精神创伤。小说进一步强调麦卡洛太太的人物视角仅聚焦于身体表现符号“肚子”上。“叙述视角与观察对象之间的关系往往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关系”<sup>[6]</sup>,在麦卡洛太太的视觉观察中,好友圆滚的肚子作为父权社会中产阶级生育能力的象征,对“空荡子宫”形成权利碾压。通过麦卡洛太太的生育经验叙事,读者最终发现真正的悲剧不在于流产本身,而是麦卡洛太太对父权规训的内化导致了她的悲剧性沉默。在共情其痛苦时,读者也因为质疑她声称的对米拉贝尔的无私的爱而产生更大的人物距离——当她声称美玲需要稳定的生活时,实则是将孩子物化为填补自身情感空洞的工具。

叙述者通过选择两位母亲的人物视角,一一展现两者的伦理立场,两者对抚养权的坚持都能得到读者的情感支持。“但对小说而言,每个人物的意图并不重要,重要的通过多个人物的对比,看出叙述者的意图”<sup>[9]</sup>,这种对比通过对人物视角的灵活运用得以实现。在对米拉聆讯结束后,理查德森太太前去看望好友,并建议她尽快向律师提交证明贝比不适合照顾孩子的证据。叙述者再次将自己从无所不知的权威位置降到人物叙述者麦卡洛太太的有限位置,以她的眼光观察到贝比的体型曾经在几个月间产生过巨大变化,由此怀疑贝比在案件审理期间再次怀孕并堕胎。故事真相的还原速度以麦卡洛太太的视点加以限制,读者只能从聚焦人物的视角来解读贝比的异常的身体变化,麦卡洛太太作为见证人的视角也容易赢得读者的信任,影响读者的伦理判断。但接下来,全知叙述者又回归到无所不知的权威地位,直接揭示真相:由于贝比在聆讯前期经受巨大的煎熬和痛苦,其体重急速异常变化。读者发觉自己作出判时的盲目与冲动,而对贝比这一人物产生更大的愧疚感和伦理同情。通过对人物视角的控制,叙述者使读者在此刻因为麦卡洛太太的不可靠叙述,意识到了她思想上的偏见和局限,从而让贝比赢得了更多道德上的认可。

通过人物限知视角的内容呈现,小说揭示了母亲身份伦理的复杂性:麦卡洛太太和贝比都期待通过重获母职重建母性道德,但两者的伦理立场却因阶级、种族与文化的差异而被社会赋予截然不同的道德权重,而小说利用限知视角的局限性开辟了边缘人反抗霸权的叙事突破口,以文学想象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跨文化伦理叙事中更为多元性和批判性的思考空间。

### 3 视角转换的张力：权威叙事的解构和伦理引导

如江守义所说，“作品的整体伦理效应，不仅包含某种视角的伦理效应，更应重视视角转换所带来的伦理效应的变化”<sup>[9]</sup>。小说的视点不仅暗含叙事者的伦理态度，还深刻影响了读者的伦理思考和回应。在米拉贝儿抚养权争夺案件的叙述进程中，全知叙述者并非站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高地对这一伦理事件进行伦理干预或者伦理批判，而是交替对养母麦卡洛太太和生母贝比进行“内省”和“外察”，叙事视角在麦卡洛太太的赎罪式母职与贝比·周的母性觉醒之间形成镜像结构：前者以意识流手法剖白七次流产造成的心理创伤，使白人养母对“完整家庭”的偏执追求获得病理阐释，后者则借助华裔单身母亲的双重身份视域，将移民的经济困境与哺乳期女性的身体困境融合成跨文化语境下的女性经验书写。人物间叙事视角的转换使读者被抛入流动的伦理场域之中，最终指向更具批判性的认知维度和衡量母性伦理的价值尺度：当种族、阶级成为为母职能力的评判标准，所谓给孩子更好的生活不过是权力话语对边缘性群体的驱逐。

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全知视角对法律程序的“权威中立”呈现也经由聆讯期间正反方律师的多重人物视角所解构。在法庭上，正反方基于不同的伦理立场向法官“选择性”呈现证词，并展开“贝比是否适合做母亲”的叙事竞赛<sup>[5]</sup>，则暗含了法律辩论的虚伪性——所谓的法庭上的“客观事实”也离不开人为的操控，被解构为立场先行的修辞产物。值得注意的是，在收养案的叙事闭合中，小说并非直接以全知视角交代法庭判决，转而通过辩护律师理查德森先生的视角和声音告知了法庭判决：“孩子跟着马克和琳达。我们赢了”<sup>[5]</sup>。此处视角转换的伦理意图也意指白人主流社会中看似公正的法庭判决也由族裔政治所左右。

败诉的贝比躲在马路牙边凝视着麦卡洛家的房子，此时贝比的人物视角展现了剧烈且复杂的母性情感。在物质鸿沟面前，她似乎接受了判决，在她想象中，得到抚养权的麦卡洛夫人能够取代自己，每天“走入育儿室，贝比的女儿在里面等着她”<sup>[5]</sup>。但当聚焦人物回归为麦卡洛夫妇时，她们却发现“米拉贝儿不见了”<sup>[5]</sup>。人物视角的碎片化闪回形成强烈的对比，正对应这场婴儿伦理争夺结果发生惊人反转。全知视角继而揭示了机票预订线索，贝比先前的凝视转化为伦理行动的预叙，完成了这一人物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反抗的伦理主体重构，更通过阅读认知延时效应迫使读者重估“理性选择”的工具价值本质，进而认可

“错误的理性选择终将被母性情感所战胜”<sup>[10]</sup>。贝比拒绝让女儿面临跨族裔收养中无法弥合的身份撕裂的伦理选择，也正体现了斯皮瓦克所倡导的底层女性的异质性生存经验，“这正是策略上的、能够在反抗中起到临时作用的底层的主体意识”<sup>[6]</sup>。

更具伦理引导意义的是理查德森家的小女儿伊奇的视角流动。伊奇的边缘化儿童视角构成认知暴力体系的爆破装置，现代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傻子视点”、“儿童视点”等都属于最经典的特殊人物聚集方式，这种非常规聚焦的伦理意义，在伍茂国<sup>[11]</sup>所指的认知特权中呈现双重突破：其一，作为固化的权力认知体系的裂隙制造者，伊奇勇敢站出来为黑人女孩德亚伸张正义，采取“疯癫他者”的形象对抗学校老师的种族歧视和侮辱；其二，在米拉贝儿收养案中，伊奇的边缘视角与贝比的人物感知形成复调对话，两者的“出走”实际是为了“完善自我意识，建立伦理关系而作出的正确的伦理选择”<sup>[12]168</sup>。相较于母亲理查德森夫人作为白人社会卫道士的伦理取位，伊奇充当的恰恰是理想乌托邦秩序的反叛者和挑战者。伊奇坚称其父亲是“偷孩子的”<sup>[5]161</sup>，认知正是出于她对血缘伦理优先性的价值认同。在法律判决结果出来后，从伊奇的视角观察到哭泣的贝比“发出动物般的声音，有一种不顾一切的决绝”<sup>[5]</sup>，这份“决绝”也是对后续贝比的伦理越界的准确感知。伊奇的“儿童视角”进一步解构了成人世界的伦理权威，揭示了非主流叙事对伦理判断的补充作用。

在《小火》一书中，叙事者通过叙述者与人物之间的视角转换推动情节发展，并转换不同人物内部的视角来深化主题表达。小说既借助全知视角向读者全面展现故事与人物，又在叙述过程中融入判断与评价，从而清晰地确立其伦理标准；同时，小说也通过采用人物有限视角，让读者通过故事人物的眼睛观察，主动参与对故事的分析与人物的评价，进而作出自己的伦理判断。这种视角转换带来的叙事张力不仅解构了单一叙事视角的权威，还为读者提供了更为多元的伦理思考空间。

### 4 结语

《小小小小的火》一书中以华裔女婴米拉贝儿抚养权争夺案作为小说核心情节，通过对“母亲身份”的深刻探讨，展现了案件中各色人物基于不同的伦理身份所面临的伦理困境和伦理选择：在全知视角下展现了故事他者所遭受的东方主义凝视下的认知暴力；人物有限视角开辟了边缘叙事反抗霸权的叙事突破口，展现母性道德的多样性；而视角转换实现了对权威叙事的解构实现伦理引导。在不

同视角的相互作用下,读者被反复卷入这场伦理事件的剧烈交锋中,面对是有血缘纽带的贝比还是能提供稳定环境的麦卡洛太太更有立场养育孩子的核心议题,拥有不同伦理身份的人物在不同的视角安排下获得平等的话语权,进而影响读者多重的伦理思考和伦理抉择。作者也通过多样视点凸显这场跨族裔收养案中边缘人物所面临的伦理困境和伦理身份的错位,强化其小说中母性、阶级、族裔等主题,更表达了其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深切关怀。在华裔女婴收养案的叙事实验中,《小火》以其动态的视角转换超越了法律的非黑即白,为跨文化伦理超越单一文化霸权的可能性留下了星火般的希望。

#### 参考文献:

- [1] 吴玲. 现实社会批判与理想社会憧憬——以美国华裔作家伍绮诗的反乌托邦小说《小小小小的火》为例[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56(02):96-101.
- [2] 申丹, 王丽亚. 西方叙事学: 经典与后经典[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3] 江守义. 伦理视野中的小说视角[J]. 外国文学研究, 2017, 39 (02): 20-28.
- [4]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 基本理论与术语[J]. 外国文学研究, 2010,32(01):12-22.
- [5] 伍绮诗.《小小小小的火》[M], 孙璐,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1, 300, 181, 180, 301, 302, 311, 144, 156, 125-157, 340, 367, 384, 161, 343.
- [6] 李应志. 解构的文化政治——斯皮瓦克后殖民批评综述[J]. 国外理论动态, 2005,(11):42-47.
- [7] 赛义德. 东方学[M], 王宇根,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 [8] 申丹, 韩加明, 王丽亚. 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9] 江守义. 小说叙事视角的伦理阐释[J]. 文艺理论研究, 2014,34(05):180-188.
- [10] 王芳. “母亲”身份的再审视:《小小小小的火》中的母性书写与社会批判[J]. 外语教学, 2023,44(05):106-112.
- [11] 伍茂国. 从叙事走向伦理: 叙事伦理理论与实践[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3.
- [12] 余宁宁. “边缘人”的抗争与逃离——《小小小小的火》文学伦理学解读[J]. 文艺争鸣, 2021,(04):168-172.

作者简介: 肖敏(1997.05-), 女, 汉族, 江西赣州人, 硕士, 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